

溯源红阳侯历史 探讨东汉由拳县经济文化发展

郑张敏¹ 张丽敏²

(1.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0;

2. 桐乡市博物馆, 浙江 桐乡 314500)

摘要: 在实施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 嘉兴作为红船起航地备受瞩目, 而在东汉时期史称由拳县的嘉兴也是不容小觑的富庶之地。红阳侯王泓从河南舞阳西北红山之南, 迁封会稽郡由拳县语儿乡, 可见东汉时期, 嘉兴城市的建置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也带动了这一地区文化和商业的进步。红阳家铜钟、青铜灶、陶屋、陶井等文物随其主人王泓长眠于由拳县语儿乡地下。两千年后偶然的契机, 考古工作者拨开了历史的尘埃, 让这些国宝重现人间。红阳侯迁居秀水江南, 他们保留中原文化, 对这一区域在思想、心理、风尚等有着深刻的影响。溯源嘉兴桐乡红阳侯历史文化与河南省长葛市的两汉红阳侯国的综合性研究, 探索发展红阳侯国遗址旅游业生态文化品牌符号价值生产, 不断提升嘉兴桐乡红阳侯国遗址的数字化资源保护和热点开发。桐乡红阳侯国相关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播及其有关学术研究, 推进东汉由拳县(今嘉兴)县级政区地理研究的进程。

关键词: 东汉; 红阳侯; 历史溯源;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一、课题研究背景

在耿维祐纂修的光绪版《石门县志》中对于西汉御儿侯轅轸古有一个很敏锐地观察。如卷一《建置》说:“春秋战国时, 樛李、御儿俱望地。秦易樛李为由拳且为县, 则御儿为乡”, 而“轅轸古之封, 止是亭侯”。由于这种重要的指示, 课题组深感嘉兴桐乡与列侯食邑的密切, 故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 就有此课题的产生。

本课题基于出土实物为研究对象, 通过文献分析的方式, 从技术的角度, 对东汉列侯授封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其爵制的源流关系, 有补于东汉嘉兴政区的研究和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 突破了清代学者的研究窠臼, 为后来的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打开方便之门。

《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与历史文化资料整理研究》于2020年3月正式开题。该项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梅坤前辈就已着手研究。东汉红阳侯王泓墓是于1983年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县崇福镇芝村星火地东村发现的, 至今已有近四十年之久。但是,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和历史专题来说, 相关学术研究工作还仅仅是一个开始。目前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已完成, 下一步就需要专家学者长时间的研究, 才可能让红阳侯国真实面貌尽可能还原于世人面前, 从而更深层次地揭示嘉兴桐乡, 即东汉由拳县语儿乡的文化现象, 进一步提升嘉兴桐乡汉代历史文化的地位。

二、课题研究价值

本课题属于东汉列侯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 其时空自然在“东西两汉”的范围内。汉代列侯不是官职, 是爵位。两汉时期, 在地方上继承秦朝的郡县制, 同时又分封同姓诸侯国, 实行郡国并行制。再次, 东汉永建四年(129年)之前, 浙江地, 属会稽郡十之八, 属丹阳郡十之二, 则红阳侯王泓墓在当时的由拳县语儿乡, 属会稽郡, 是和丹阳郡交界。最后, 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 就是科学的佐证, 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的记

载相衔接, 侯国历史与汉代县级政区地理分布又接近, 考虑红阳侯王泓墓与汉代侯国历史的紧密时空关系, 本课题就从动态方面考虑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的研究价值。

1. 课题组对出土的青铜器的研究, 揭示了红阳侯王泓墓出土文物的主要来源、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 包括青铜器铭文的解读、铜器的称谓和性质、制作工艺等研究成果, 将以往学术界的有关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一是铜钟、铜灶等随葬品, 与当时社会“意识、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从全国汉墓出土实物显示, 大多数汉青铜钟, 一般出土于帝王或高级贵族的墓内及陪葬坑中。有的自铭曰“壶”, 有的自铭为“钟”, 钟和壶应是同一类型的器物, 即一件盛酒器皿。钟又代表一定的容量。用它度量的应为粟而非酒水。就厚葬而言, 又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一种证明。遵循“事死如事生”的原则, 即死者生前享受的东西作为随葬品埋入了墓中, 幻想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能享受荣华富贵。二是就制作者与使用者而言, 课题组已经初步判断红阳家铜钟, 属于地方工官制作, 地方及王侯使用的这类铜器。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如果能证实这件铜钟由红阳侯所属的制造机构造作的, 那么, “红阳家”三字, 具有现代社会中“商标”的意义。

2. 这件“红阳家铜钟容一石第三至廿”带铭文的青铜器, 是桐乡出土带铭文的青铜器的一次重大发现。其中, 铭文中称“家”, 即汉代列侯的食邑。东汉侯国无传表。谨按红阳侯有二: 一见于班固《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河平元年(前28年)六月乙亥, 红阳荒侯王立以皇太后弟关内侯建侯, 元始四年(4年), 侯柱(王立之子)嗣, 王莽败, 绝。二见于《汉书·元后传》: 建武元年(25年), 红阳侯王泓以父丹(王立次子)为将军, 战死, 往与上有旧, 由武桓侯绍封侯。

东汉红阳侯王泓墓中出土的铜钟, 课题组研究证明此钟的确是代代相传, 其铸造年代从西汉晚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早期。吴小平《汉代铜壶的类型学研究》东汉红阳侯王泓所以留居由拳县语儿乡, 固然与光武复汉的过程中不间断地封置侯国有关, 但这些侯国根本没有处于光武帝的管辖之下, 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见这件红阳家铜钟及其铭文在东汉学术发展源流研究方面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三、课题研究目标

1. 桐乡红阳侯王泓墓和侯国遗址中的大量考古信息, 可以填补东汉桐乡区域无侯国的空白, 以及红阳侯国相关研究成为秦汉史研究的前沿课题。

2. 以墓葬及文献资料为中心, 开展桐乡红阳侯历史文化与河南省的两汉红阳侯国的综合性研究, 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嘉兴桐乡, 或河南省长葛市(两汉红阳侯家族墓葬群在长葛市石固镇发现)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3. 桐乡红阳侯国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课题研究, 构建了如何进一步保护与开发桐乡红阳侯国遗址的框架,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 探索发展红阳侯国遗址旅游业生态文化品牌符号价值生产, 不断提升桐乡红阳侯国遗址的数

化保护和开发。

四、课题研究成果

1. 红阳侯王泓迁封会稽郡由拳县语儿乡，当时称为“江南下湿”之地。可见东汉时期，嘉兴城市的建置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相应地带动了这一地区商业的进步。所以桐乡红阳侯国相关历史研究和文化传播及其有关学术研究，推进了东汉由拳（今嘉兴）县级政区地理研究的进程。

研究显示，红阳家铜钟随其主人王泓长眠于语儿乡地下。世事轮转，斗转星移，两千年后一个偶然的契机，考古工作者拨开了历史的尘埃，让这件国宝重现于人间，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解释了红阳侯国相对应的红阳县。

2. 红阳，《汉书》注曰：红山之阳。《汉书·地理志》记载：“南阳郡有红阳侯国。”而元以后《叶县地方志》记载，红阳城位于叶县叶邑镇倒马沟村。然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引《一统志》：故城在今舞阳县西北，红山南。

3. 研究显示，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对相关文献记载进行辨析和考订，认为墓主人死于建武六年（30年）之前。一是墓葬制度体现出中原地区视死如生的厚葬文化，墓主人享用中原特色的随葬品。如果遵循古代人入土为安回望家乡的传统思想，王泓应当归葬南阳郡，根据上述的，建武六年（30年）之前，南阳郡还未纳入光武帝刘秀的东汉政权的统治之下。二是红阳侯王泓的另一个封号武桓侯，根据武桓侯这个爵位，可知王丹、王泓及其“曾孙”一脉是骁勇善战，从军有功的。迁居秀水江南，有封邑奉养、有爵位功勋，加上朝中有人荫庇，王泓在语儿乡应该是当地一方大户。我们课题组认为，他们保留的中原文化，事实上对这一区域在思想、心理、风尚等有着深刻的影响。

五、课题研究展望

（一）东汉桐乡青铜冶铸技术对后世的影响

首先，就桐乡考古发现而言，青铜器物以饪食器（鏃斗、甑、竈）、酒器（钟、温酒鏃）、水器（洗、盆、铜、鉴、甗）为主，这些随葬品与东汉中原器物一致。这不仅反映了运用中原的冶金技术的情况，也说明了对传入地区桐乡的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按《浙江通志》记载，明清桐乡生铁冶金技术，闻于时。其次，铜钟具体表现为礼制在古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可知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绝不是偶然的事，它是时代必然的产物，因为在当时伴着汉室中兴而生的客观形势之下，有稳定南方之必要。可是在此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内，战火连天，有分裂，有统一，政权无数，从而土地失去活力，文明也随之消逝。现在我们有必要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考察东汉语儿乡富庶的情形，及由拳县（今嘉兴）经济发达的表现和影响。

（二）汉代由拳县语儿乡区域的研究

根据《东观汉记》记载：“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虫蔽天，盗贼鬪起，四方溃畔。”然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对会稽郡影响较小，中原人士有鉴于战争对他们生存的威胁，多避难到比较安全的南方来。按王充《论衡·自纪篇》：“其先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他祖上曾从军立有军功，被封为会稽郡的阳亭侯。魏郡元城王氏势力迁居秀水江南，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从而证明王氏一部分势力在当时的由拳县（今嘉兴）语儿乡（今崇福），有据可考。进一步了解郡国并行制对嘉兴政治经济的影响。会稽郡一由拳县一语儿乡，为郡—县二级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同时又有分封制的存在。袁康在《越绝书·外传记

越地传》记载了“语儿乡”，显而易见，语儿乡已然是一个认可的地域概念。从而说明南方土地的开发，县邑数量的增多，这些县邑对于农业生产的意义，这是没有疑义的。固然，当时经济重心在北不在南，但是大批生力军南迁以后，正好利用他们的进步的技术和刻苦耐劳的精神来开发南方蕴藏丰富的处女地，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主要参考范志军《东汉江南经济发展探讨》。

（三）南阳村，南阳祠庙等以南阳命名的研究

由于历史久远，我们对周边“村名”的诠释亦到了不知所以然的地步，比如崇福镇下属南阳村，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隐现出桐乡历史最遥远的背影。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说明了这里曾是桐乡红阳侯国所在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南阳郡有红阳侯国”。唐李白的《南都行》：“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南阳郡出了许多英豪，他们的业绩巍巍，渺然不可攀。可见“南阳”，对于偏安江南一乡，大片肥沃封地被占据的东汉第一代红阳侯王泓，其意义非同一般。

南阳得名由来，文献记载较为明确。《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二》载：“秦昭襄王取朝地，置南阳郡，以在中国之南而有阳地，故曰南阳。”南阳，联系游子的乡愁，因凝结为一个家族的眷恋而发生伟大的力量。

综括上所述，东汉红阳侯王泓墓在桐乡发现，其贡献在于解决二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红阳侯国国除之年”“红阳县省并时间”，以及光武复汉之初承袭的是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年—5年）的政区，基本沿用了郡县制为实体、州刺史部为监察的体制。至东汉末年，行政区划由虚的三级制演变为实的三级制，由郡县制演变为州郡县制。因此，东汉时期会稽郡由拳县语儿乡，我们课题组可以说，一方面这片肥沃土地价值早在东汉时期日益体现出来，它连接着南阳郡红阳县的红阳侯国，这与光武复汉，稳固皇权来封置侯国有关。另一方面，东汉初期会稽郡由拳县（今嘉兴）实行郡国两制并行，随着东汉政权坚固而势力雄厚，财富与日俱增，县级政区发生激烈的变动，形成州、郡、县三级制的地方管理体系，即扬州会稽郡由拳县。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后，会稽郡析吴郡，只有其东部注明侯国。范晔《后汉书·郡国志》可见在光武帝刘秀时确定的行政区划基础上进行改革式调整。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成果需要向公众传播，这样的遗址需要长久保存、科学利用。面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的工作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 [1] 班固. 汉书 [M]. 上海: 大光书局, 1936.
- [2] 范晔. 后汉书 [M]. 上海: 大光书局, 1936.
- [3] 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浙江得溪草堂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数字图书馆。
- [4]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清乾隆34年（1769），钱氏通经楼，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数字图书馆。
- [5] 顾炎武《日知录》，清乾隆60年（1795），遂初堂重刊本，国学导航。
- [6] 《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十一《河南通志》，中华文库。
- [7] 许瑶光. 嘉兴府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 [8] 耿维祜. 石门县志 [M]. 上海: 中华书局, 2019.